金刚界曼荼罗与新的八大灵塔信仰的融合：朝阳北塔塔身浮雕研究 *

［韩］成叙永

内容提要　本文分析了朝阳北塔浮雕的图像内涵和造型特征，并考察了其历史背景和影响。辽重熙十一至十三年，在该塔外面新制作了金刚界四方佛、八大灵塔和供养菩萨等浮雕。作者通过对这些图像题材和造型的分析，认为该塔浮雕组合表现了以毗卢遮那佛为中心的金刚界曼荼罗，融合了新的八大灵塔信仰。其中，金刚界四方佛的五佛冠体现了辽代独有的造型特征和宗教意义，而八大灵塔基于与佛顶尊胜陀罗尼信仰结合而盛行的辽代独有信仰，其塔名来自《大乘本生心地观经》。另外，该塔供养菩萨像反映了金刚界密宗的原则和信仰。通过供养菩萨手持之莲花枝柄香炉，可知这种器型由辽传播至高丽的历史事实。最后，作者分析了辽宁朝阳地区的宗教发展历史和朝阳北塔对其他辽塔的影响，认为朝阳北塔浮雕当为辽代金刚界密宗复兴的开端，对八大灵塔信仰在辽境内的传播起到了重大作用。

关键词　朝阳北塔　金刚界四方佛　八大灵塔　佛顶尊胜陀罗尼　大乘本生心地观经

在中国内蒙古自治区、辽宁省、华北地区以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现存辽代佛塔一百余座，其中以辽宁朝阳地区最为集中。朝阳为辽兴中府所在地，西邻中京，是连接辽五京的中枢。辽代早期皇室与民间信众在此地区举办过多场佛事活动，并建造了诸多佛塔，至今仍遗存14座，其中4座方形塔雕刻有金刚界四方佛与八大灵塔。这种图像组合首见于辽代佛塔，是辽代佛塔的鲜明特征，朝阳北塔浮雕在这种现象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1984至1996年，文物部门在朝阳北塔的天宫和地宫发现诸多重要文物，

*　本文根据笔者2010年韩国弘益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朝阳地区辽代佛塔浮雕图像研究》中的部分内容修改而成。

先后发表了调查简报和考古报告‹1›。学界对该塔浮雕的主要图像‹2›和佛舍利瘗藏‹3›等内容进行了基本研究，但未充分讨论浮雕的信仰背景和影响。因此本文首先简要说明该塔在辽代的重修过程及相关佛事活动，其后详细阐释塔身浮雕的图像内涵和造型特征，进而探讨浮雕的时代背景，并指出该塔对朝阳及其他地区辽塔的影响。

〔图一〕朝阳北塔
辽重熙十一至十三年（1042–1044） 辽宁朝阳 （笔者摄影）



一　辽代重修情况

朝阳北塔原是北魏太和九年(485)文成文明太后敕建的思燕浮图，隋仁寿二年(602)重修为方形砖塔。唐天宝年间(742－756)、辽早期和辽中期的重熙十一至十三年(1042－1044)曾三次重修此塔。其中辽重熙年间重修时，佛塔外观出现有划时代的变化，当初的15层变为13层，塔身和基座新制了大型浮雕〔图一〕。该塔重修前一年，霸州升为兴中府，该塔重修与行政级别变化存在紧密关联。

辽代朝阳北塔被称为"延昌寺大塔"。辽保宁十一年(979)《辽耶律琮墓神道碑》记载，太祖阿保机弟迭剌之孙耶律琮醉心佛教，曾试图延请燕京慈恩寺高僧来霸州延昌寺传教‹4›。从此事可知，延昌寺是知名度极高的密宗寺院。重熙年间重修过程中进行了两次佛寺活动， 依次在天宫、地宫内安置大量舍利装严具。由于地宫发掘前曾遭盗掘，所以现存题记主要见于天宫出土文物。下文以三件舍利庄严具的题记为中心，考察重修过程及其相关供养佛事的主要参加者及其角色。

‹1›　朝阳北塔考古勘察队：《辽宁朝阳北塔天宫地宫清理简报》，《文物》1992年第7期；张剑波等：《朝阳北塔的结构勘察与修建历史》，《文物》1992年第7期；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北塔：考古发掘与维修工程报告》(以下简称《朝阳北塔》)，文物出版社，2007年。

‹2›　［日］向井佑介：《朝阳北塔考》，《辽文化・辽宁省调查报告书》，页177－222，京都：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2006年；［韩］周景美：《辽代八大灵塔图像研究》，《中亚研究》14号，2009年；［韩］成叙永：《朝阳地区辽代佛塔浮雕田禾立像研究》，弘益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韩］成叙永：《辽代八大灵塔的图像特征与出现背景》，《辽金历史与考古国际学术研讨会议论文集(下)》，辽宁教育出版社，2012年；成叙永：《朝阳北塔浮雕图像研究》，《美术史研究》27号，2013年。

‹3›　Hsueh-ManShen, "Realizing the Buddha's Dharama Body during the Mofa Period: A Study of Liao Buddhist Relic Deposits", *Artibus Asiae*, 61-2 (2001)；［韩］周景美：《辽兴宗年间佛舍利庄严研究》，《中国史研究》35号，2005年；［韩］周景美：《辽宁省朝阳地区的辽代佛舍利庄严研究》，《中国史研究》53号，2008年；［韩］周景美：《辽代朝阳北塔出土经幢研究》，《东岳美术史》10号，2009年；［韩］金延美：《辽代朝阳北塔舍利孔与真言宗如法尊胜法的起源》，《美术史与视觉文化》10号，2011年。

‹4›　李逸友：《辽耶律琮墓石刻及神道碑铭》，《东北考古与历史》1982年第1期；朱子方：《辽耶律琮神道碑碑文校正与阐释》，《辽海文物学刊》1996年延缓2期。

〔图二〕朝阳北塔天宫出土的经塔
辽重熙十二年（1043）
辽宁朝阳北塔博物馆藏 （笔者摄影）



其一，经塔内置的第三重金筒上镌刻有上京僧录宣演大师蕴珪的题记‹1›，证明该座经塔安置于重熙十二年四月八日。据该塔天宫石函东面的重熙十二年《都提点佛塔佛事》记载，蕴珪作为主要责任者参加了第一场佛事活动‹2›。次年，他已非上京僧录，但依然作为总责任者再次参与‹3›。通过此后举行的庆州白塔皇室供养佛事，能够确认蕴珪在上述两场佛事中的核心作用。据庆州白塔刹座中出土的重熙十八年《螭首造像建塔碑》可知，蕴珪是排在最前面的一位沙门‹4›，那年他在天宫中放置了无轴纸本陀罗尼一卷，此卷发现于天宫南室内一尊白衣观音像的经筒式台座内。白衣观音在辽朝早期一直被奉为皇室的家神，在举行国家祭祀祭山仪时被奉为主要礼拜尊像之一，尤其在辽兴宗改变祭山仪的程序后，将礼拜白衣观音放在首位‹5›。考虑到辽代皇室对白衣观音的深厚信仰，在白衣观音台座内安置陀罗尼应该是当时供养佛事中比较核心的一部分，蕴珪正是负责这些任务的关键人物。

其二，据鎏金银塔内置的银经卷和铜板中的两则题记可知〔图二〕‹6›，重熙十一年匠人张从道与甄守则施舍银经卷，重熙十二年守司户参军轩辕享先写梵文陀罗尼，之后匠人张从道在铜板上镌刻其字。通过张从道参与两者制作可知，重熙十一年已开始准备第一场供养佛事。轩辕享通晓梵文，还参加了第二次供养佛事，监修地宫内置的经幢上的梵文陀罗尼。此外，韩咏既是霸州官员，也是延昌寺邑社信徒，在这两场大型供养佛事中慷慨施舍‹7›。绝大多数霸州官员都参加了这两场活动，题记上的主要官员名录全部磨损不清，但通过这两位官员的事迹可知，霸州官员不仅赞助供养佛事，且积极参加舍利庄严具的制作，为供养佛事耗费了大量心血。

其三，天宫内安置的木胎银盒四面都刻有线图，其中一侧提供与题记同等重要的实物证据。盒子侧面刻着一幅说法图，图中有听佛说法的帝王，身穿长袍，双手捧笏，头戴冕旒冠〔图三〕，冠中刻“王”字，这位帝王很可能是现实中的辽兴宗耶律宗真‹8›。辽兴宗于景福元年（1031）登基，重熙三年因政见冲突，将其生母

‹1› 前揭《朝阳北塔》，图44。

‹2› 前揭《朝阳北塔》，页66。

‹3› 前揭《朝阳北塔》，页85。

‹4› 德新、张汉君、韩仁信：《内蒙古巴林右旗庆州白塔发现辽代佛教文物》，《文物》1994年第12期，页33。

‹5› 《辽史》卷四九《礼志一》，页835。

‹6› 前揭《朝阳北塔》，页67—69。

‹7› 前揭《朝阳北塔》，页81、83。

‹8› 对此，学界有不同的看法。《朝阳北塔》称，释迦牟尼两边的人物分别为帝王形象的“梵王”和贵妇人形象的“帝释天”，参见前揭《朝阳北塔》，页72。金延美据《辽史》记载，称此人物表现的是皇室家族的神格化形象参见前揭《辽代朝阳北塔舍利孔与真言如法尊胜法的起源》，页189、209注104。

法天太后放逐到庆州七括宫并幽禁。其后兴宗听讲《报恩经》时大恸感悟‹1›，重熙八年遣使迎母回宫，在此前一年的十一月幸寺院受菩萨戒‹2›，明确表明自己是佛门弟子。这幅说法图中的帝王可能表现的正是作为佛门弟子的辽兴宗的形象‹3›。由此可知，重熙年间朝阳北塔的大修是与辽上京高僧蕴珪和辽皇室有关的供养佛事。

〔图三〕朝阳北塔天宫出土的木台银函
辽重熙十二年（1043）
辽宁朝阳北塔博物馆藏 （笔者摄影）



二　图像内涵与造型特征

朝阳北塔塔身四面各雕有金刚界四方佛、八大灵塔和菩萨像等，均为轻微凸起的浅浮雕，表面刻有轮廓线，线条流畅而精致，给人较强的绘画的感觉。以下笔者分别就塔身浮雕加以考察。

（一）金刚界四方佛

朝阳北塔塔身四面正中均雕有金刚界四方佛，表面大体风化。塔身西面阿弥陀佛保存了辽重熙年间重修样貌，成为研究辽代金刚界四方佛的标杆作品〔图四〕。西面阿弥陀佛头戴圆筒形宝冠，结跏趺坐于莲花台座上。宝冠正中刻有五尊小佛，周围还刻有宝相花纹与火焰宝珠等纹样。阿弥陀佛身披变形通肩大衣，此大衣两肩与两袖保存着菱形花纹，这是辽代仅存的佛衣纹样实例。该尊像结变形妙观察智印，手指弯曲成半握状，拇指和食指相连。台座束腰部位刻有五只孔雀，孔雀的眸子和头上花蕊模样的装饰羽表现更加细致。

除了手印和台座之外，其他三尊像的造型与西面阿弥陀佛完全相同。南面宝胜佛结与愿印，台座束腰仅保存着两匹马的浮雕。北面不空成就佛结施无畏印，台座束腰刻有五只迦楼罗。塔身东面阿閦佛结触地印，台座束腰刻有五头大象〔图五〕。

该塔金刚界四方佛沿袭了唐代时确立的图像传统，同时又具有辽代的风格特色，主要特征有以下四点：

第一，朝阳北塔金刚界四方佛构成金刚界曼荼罗结构，该塔的中心象征金刚界主尊毗卢遮那佛。方形佛殿实际设置于该塔中宫，被认为是毗卢遮那佛像原本安置处‹4›，且该塔天宫出土的单层舍利塔塔身四面线刻

‹1›　（南宋）叶隆礼：《契丹国志》卷八《兴宗纪》，页88，中华书局，2014年；（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篇》卷一二七，页3006，中华书局，1985年。

‹2›　《辽史》卷六八《游幸表》，页1064－10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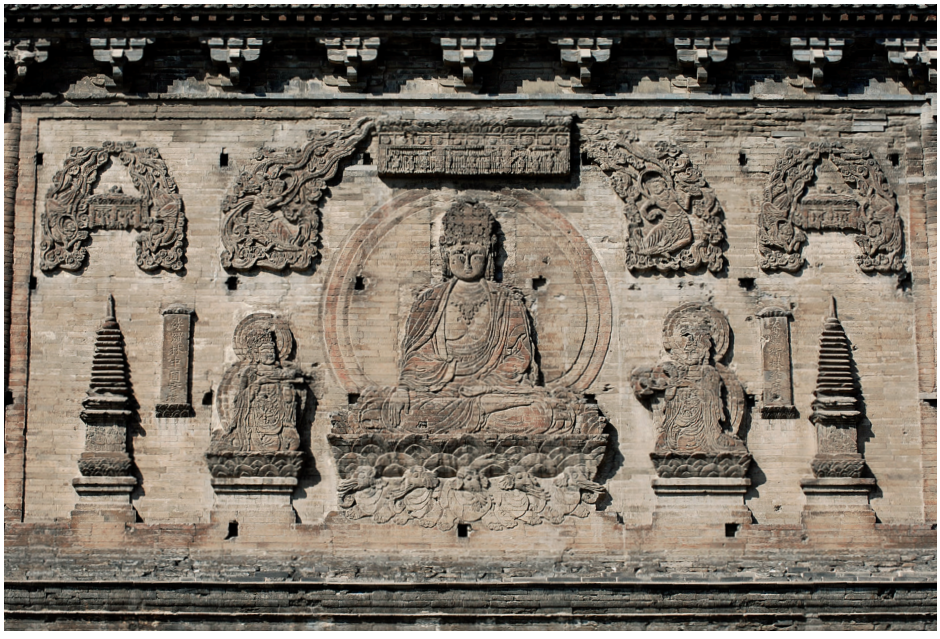
‹3›　拙作：《十至十二世纪东亚都城和帝陵考古与契丹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以下简称“十至十二世纪东亚都城论文集”），页455，注32，科学出版社，2013年。

‹4›　前揭《朝阳北塔》，页118－122。

〔图四〕朝阳北塔塔身西面
辽重熙十一年至十三年（1042–1044）
辽宁朝阳 （笔者摄影）



〔图五〕朝阳北塔塔身东面
辽重熙十一年至十三年（1042–1044）
辽宁朝阳 （笔者摄影）



金刚界四方佛，塔内北面线刻毗卢遮那佛，整体形成五方佛构造‹1›。

金刚界五方佛体系在盛唐不空译《金刚顶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现证大教王经》(以下简称“金刚顶经”)中确立。同为不空译《金刚顶瑜伽三十七尊出生仪》陈述了在佛塔中安置的金刚界五方佛：“是以由大圆镜智，厥有金刚平等现等觉身，则塔中之方东阿閦如來也。由平等性智，厥有义平等现等觉身，即塔中方之南宝生如来也。由妙观察智，厥有法平等现等觉身，即塔中方之西阿弥陀如来也。由成所作智，厥有业平等现等觉身，即塔中方之北不空成就如来也……即塔之正中毗卢遮那如来也。”‹2› 这段记载以塔的构造为前提，并将五智和五方佛直接连接，着重强调塔与金刚界曼陀罗的相关性，是朝阳北塔金刚界四方佛的典据。

该塔金刚界四方佛最终呈现的是金刚界曼陀罗世界，即主尊毗卢遮那佛的智慧作

‹1› 前揭《朝阳北塔》，67页。

‹2› 《大正藏》第十八册，页297c。

用而具象化的觉悟世界。在不空译《金刚顶经》中说此曼荼罗的示现[1]：“一切义成就菩萨”，即成道前的释迦牟尼佛，修五相成身观，其后成就毗卢遮那佛之五智，继而显示圆满的佛身，最终成为金刚界如来，即毗卢遮那佛。从毗卢遮那佛的智慧出生金刚界四方佛，从此又出生十六大菩萨，而通过毗卢遮那佛与四佛的相互供养再出生十六供养菩萨，总出生金刚界三十七尊，此三十七尊又无限扩张。事实上，该塔天宫内出土的鎏金六角银塔塔身六面刻有金刚界五方佛与释迦弁尼佛。

第二，朝阳北塔金刚界四方佛的手印和台座沿用了唐代翻译的经典记载，但西面阿弥陀佛的手印表现沿袭了唐代造像实例。在不空译《金刚顶经》中记载：毗卢遮那佛结觉胜印，不动佛结触地印，无量寿佛结胜定印，宝生佛结施愿印，不空成就佛结施无畏印[2]。同时期金刚智译《金刚顶瑜伽中略出念诵经》卷一中记载：毗卢遮那佛结坐于狮子座，阿閦鞞佛坐于象座，阿弥陀佛坐于孔雀座，宝胜佛坐于马座，不空成就佛坐于迦楼罗座[3]。

这些图像是唐代时确立，经五代流传至辽代的。现存最早的实例为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唐咸通十二年(871)四十五尊造像盝顶银函〔图六〕。此舍利函四面四方佛，以盖上结智拳印的毗卢遮那佛为中心，形成金刚界五方佛体系，五佛的方位和手印与朝阳北塔的五佛表现完全一致。敦煌出土的9世纪末至10世纪《不空绢索五尊曼荼罗图》与《五佛曼荼罗图》中也描绘了金刚界五佛〔图七〕，其台座中还描绘了象征各个方位的动物，这点与朝阳北塔一致。此外，云南崇圣寺千寿塔天宫出土的五方佛皆结经典中的手印，也形成金刚界五方佛体系。

朝阳地区佛塔上的金刚界四方佛也沿袭了这些图像范式，但西面阿弥陀佛则有不同的手印表现。朝阳北塔西面阿弥陀佛结变形妙观察智印。在金刚智译《金刚顶经瑜伽修习毗卢遮

〔图六〕**陕西法门寺出土的四十五尊造像盝顶银函**
唐咸通十二年（871）
陕西法门寺博物馆藏



〔图七〕**五佛曼荼罗MG.17780**
敦煌9至10世纪初
法国吉美博物馆藏 （法国吉美博物馆提供）



‹1› 《大正藏》第十八册，页298a。

‹2› 《大正藏》第十八册，页221a—222b。

‹3› 《大正藏》第十八册，页227b—227c。

〔图八〕云接寺塔塔身西面
辽代　辽宁朝阳　（笔者摄影）



〔图九〕兴城白塔峪塔塔身西面
辽大安八年（1092）　辽宁兴城　（笔者摄影）



〔图十〕辽上京南塔西面阿弥陀佛
辽代　辽上京博物馆藏　（辽上京博物馆提供）



那三摩地法》(以下简称“三摩地法”)中说[1]，妙观察智印是两手相叠，掌心向上，拇指和食指相连。朝阳北塔阿弥陀佛两手不相叠，在这一点上与经典的记载有所差异，这种手印起源于法门寺四十五尊盝顶银盒的阿弥陀佛〔图六〕。朝阳地区大宝塔和青峰塔的西面阿弥陀佛也结这种手印，但云接寺塔和东平房塔的西方阿弥陀佛皆是拇指和中指相连，而伸出食指交叉呈X形，这也是从妙观察智印衍生出的一种变形手印，受到朝阳北塔西面阿弥陀佛的影响〔图八〕。大安八年(1092)白塔峪塔四方阿弥陀佛、天庆年间(1111—1120)绥中妙峰寺塔阿弥陀佛也结这种手印〔图九〕，可知，朝阳北塔的影响范围并不局限于朝阳地区，而是对其他地区辽塔也产生了影响。此外还有辽代金刚界阿弥陀佛结变形妙观察智印的实例。例如，阜新营子塔的西方阿弥陀佛双手握拳，两拳相贴，而大康十年(1094)大宝千佛石幢的西方阿弥陀佛、辽上京南塔西面阿弥陀佛双手握拳，仅拇指相贴〔图十〕。笔者认为，这两种手印亦是受到朝阳北塔四面阿弥陀佛的影响。

第三，朝阳北塔五方佛皆表现为戴五佛宝冠的菩萨形象。该塔外壁没有显示主尊毗卢遮那佛，但该塔天宫出土的经塔刻有主尊毗卢遮那佛，亦表现为戴五佛冠的菩萨形象〔图二〕。这一形象与金刚智译《三摩地法》的记载一致：“毗卢遮那佛如来，身色如满月，首戴五如来冠，垂纱縠天衣璎珞严身。”[2]而其五佛宝冠则与唐元和五年(810)般若译《大乘本生心地观经·成佛品》(以下简称“心地观经”)最为相符：“我今首上有大宝冠，其天冠中五佛如来结跏趺坐，我是毗卢遮那如来。”[3]

‹1› 《大正藏》第十八册，页328c。

‹2› 《大正藏》第十八册，页329c。

‹3› 《大正藏》第三册，页329c。

〔图十一〕朝阳北塔塔身西面阿弥陀佛
辽重熙十一年至十三年（1042–1044） 辽宁朝阳 （笔者摄影）



该塔金刚界四方佛的形象与上述其出生缘由有密切关联。据不空译《金刚顶经》，从毗卢遮那佛的智慧出生金刚界四方佛[1]。金刚界四方佛是拟人化四智的形象，四智是毗卢遮那佛的法界体性智分成的四方面，金刚界四方佛继承毗卢遮那佛的属性，因此其与主尊毗卢遮那佛一样，皆表现为戴五佛冠的菩萨形象。且毗卢遮那佛是常住三世净妙法身，并象征至高无上的佛教真理，所以本来没有具体形象但为了众生教化不得不具备具体形象。该塔主尊毗卢遮那佛是以菩萨的形象显现，这是由众生开示悟入的“方便”，这点同样适用于金刚界四方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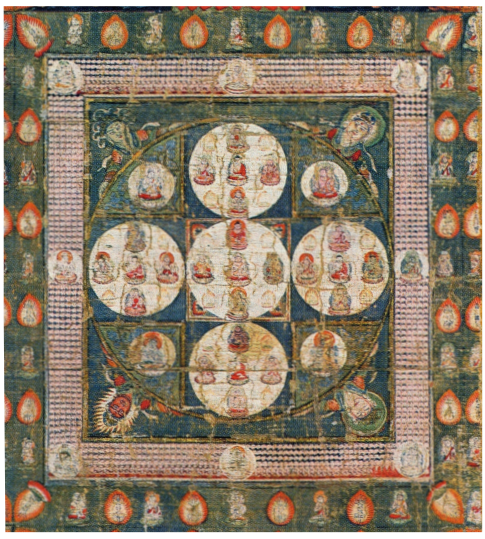
第四，朝阳北塔金刚界四方佛的五佛宝冠浓缩了金刚界曼荼罗之核心教理，此教理和装饰纹样传播到了全辽国与回鹘地区。该塔西面阿弥陀佛的宝冠正中间刻有五尊小佛，均趺坐于小月轮中，五个月轮安置五方〔图十一〕。此宝冠上的五佛结构与日本东寺藏《元禄本金刚界曼荼罗》成身会中的五解脱轮完全一致〔图十二〕。《元禄本金刚界曼荼罗》是日本元禄六年(1693)第四次转写传承下来的金刚界大曼荼罗，其源流在日本大同元年(806)弘法大师空海请来的唐代《根本曼荼罗》。元禄本绘制的金刚界九会曼荼罗，其中心绘制成身会曼荼罗，该会上展开金刚界三十七诸尊，从此会开始又展开下八会曼荼罗，故而此会是金刚界曼荼罗之根本。其中的五解脱轮为五佛驻在处，象征金刚界密宗的核心五智五佛。

在辽朝境内多见戴有五智五佛冠的辽代尊像，如北京通州出土的经幢毗卢遮那佛石刻像、宁城大明塔南面毗卢遮那佛、锦州大广济寺塔南面毗卢遮那佛、辽上京南塔北面不空成就佛与西面阿弥陀佛〔图十〕等。可知，该塔四方佛的宝冠上的五智五佛图案及其内涵已传播到全辽国。

朝阳北塔四方佛的宝冠最上端饰有如意头纹，其上还装饰有火焰宝珠。五佛的两侧上下装饰着四朵盛开的宝相花纹，其下两侧各刻有一朵粗壮的云气纹，在最下端沿着发际线刻有帷幔形纹样〔图十一〕。帷幔形纹样是在该塔四方佛的宝冠中出现的罕见的装饰纹样，一对粗壮的云气纹也是辽代宝冠首次出现的特征。这类宝冠形式与纹样直接影响到大宝塔、云接寺塔 、白塔峪塔的宝冠。大宝塔四方佛的宝冠两侧上下还刻有宝相

‹1› 《大正藏》第十八册，页208a。

〔图十二〕日本东寺藏元禄六年（1693）
《元禄本金刚界曼荼罗》中成身会部分



〔图十三〕柏林印度美术馆藏高昌出土的菩萨图
来自*Along the ancient silk routes: Central Asian art from the West Berlin State Museums*, Berlin,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1982, 图150



花纹，其上端刻火焰宝珠。云接寺塔四方佛的宝冠正面刻着宝相花纹以替代五佛，此花纹分布于五方，宝冠上端饰有如意头纹〔图八〕，白塔峪塔四方佛的宝冠亦与此相同，但南面宝生佛的宝冠上刻有四尊小佛，这是辽代以后维修的〔图九〕。

这类辽代宝冠传播到了同时代的高昌。高昌出土的菩萨图中描绘一尊菩萨，此菩萨戴的宝冠与朝阳北塔四方佛的宝冠的装饰纹样如出一辙〔图十三〕，甚至宝冠下端的一对粗壮的云气和珠子装饰都极为一致‹1›。当时回鹘和辽国之间的商业活动极其活跃，这件帛画菩萨图可能是在这个过程中从辽国传到高昌的。

（二）八大灵塔

朝阳北塔塔身四面共有8座小塔及小塔碑，碑上刻着各塔的名称〔图四、图五〕。塔名分别是净饭王宫生处塔、菩提树下成佛塔、鹿野园中法轮塔、给孤独园名称塔、曲女城边宝堦塔、耆阇崛山般若塔、庵罗卫林维摩塔和娑罗林中圆寂塔。八座小塔是从塔身南面的“净饭王宫生处塔”开始，顺时针安排的。其形式皆为十三层密檐式塔，各塔主要依靠碑上所刻名称区分，但塔身东面的两座小塔上分别刻有维摩居士与释迦涅槃像，二塔的名称及内涵一目了然〔图五〕。

八座小塔借用印度八塔的概念，即印度佛教徒在佛陀的八大圣地上建立八塔，纪念释迦牟尼的事迹 。在有关印度八塔的记载中，《心地观经》记载的八塔名与朝阳北塔的八大灵塔名称完全一致。《心地观经・序品》中两次提到了八大宝塔名：一是在正文内容中叙述，如来进入师子奋迅三昧时，佛的身上诸毛孔发出金色光，其光明中显示八大宝塔‹2›；二是狮子吼菩萨又念诵其内容的偈颂‹3›。而重熙十三年张轮翼所撰《罗汉院八大灵塔记》（以下简称“灵塔记”）记载：“心地观经云，释迦在祇园演法之初，此八大宝塔，一切相貌，现金色光明中。”‹4›此处谈及《心地观经・序品》中

‹1› 前揭《十至十二世纪东亚都城论文集》，页439—440。

‹2› 《大正藏》第三册，页294a。

‹3› 《大正藏》第三册，页294c。

‹4› 陈述辑校：《全辽文》页159，中华书局，1982年。

〔图十四〕大明塔塔身南面
辽代　内蒙古宁城县　（笔者摄影）



的内容：如来进入三昧时，以显示八大灵塔，教化众生并引菩提心，之后从三昧中醒过来，为了众生说心地法门。并且《心地观经・成佛品》中指出说法的如来正是毗卢遮那佛。可见，八大灵塔的主尊是毗卢遮那佛，这点与金刚界四方佛一样。事实上该塔天宫出土的经塔中，围绕毗卢遮那佛就镌刻有八大灵塔〔图二〕。此外，兴城白塔峪塔地宫内部的最上段八面中也刻有八大菩萨、八大灵塔的名称与部分经文等〔图九〕‹1›，其名称，以地宫天顶的毗卢遮那佛名为中心，形成九圣八菩萨曼荼罗。该塔地宫的八大灵塔名，第二、第五、第六、第七和第八面的经文皆来自《心地观经・序品》，辽代八大灵塔的来源确定无疑‹2›。

八大灵塔是辽代首次出现的佛塔浮雕图像，此造像没有先例。首先，朝阳北塔的八大灵塔是十三层方形密檐塔，其形式及内涵与大塔毫无二致。十三层密檐式塔是辽代盛行的佛塔形式，来源于《大涅槃经后分・儒教品》所记，佛陀亲自付嘱阿难，在他涅槃后一定要荼毗，并建十三层七宝塔‹3›。另外，大安八年《重修净戒院水井村人造香幢记》中还记载，“佛言有十三大罪，无忏悔者……一切级重大罪，并能消灭”‹4›。辽乾统六年(1109)《沙门即空造陀罗尼幢记》与天庆十年(1120)《为亡父建幢记》也发现这些章句‹5›。可见，辽代时十三大罪的概念有蔓延之势，可能辽国人把十三层塔象视如佛者应该消灭的十三大罪。

其次，朝阳北塔的八大灵塔的榜题不仅告知塔名，还显示灵塔的神妙功能。通过内蒙古宁城大明塔的实例〔图十四〕，可以明确这一点。大明塔的八大灵塔雕刻为经幢的形式，在此二节幢身中刻着八大灵塔塔名。

‹1› 陈术石等：《兴城白塔峪塔地宫铭刻与辽代晚期佛教信仰》，《辽金历史与考古》第四集，2013年。

‹2› 鸟居龙藏首次提到辽代八大灵塔名来自《心地观经》。[日]鸟居龙藏：《辽の文化を探る》页132－133，东京：章华社，1936年。Hsueh-ManShen发现重熙十三年《灵塔记》引用《心地观经》，认为辽代八大灵塔象征佛法。前揭《Realizing the Buddha's Dharama Body during the Mofa Period》页291，注释53。杭侃认为辽代八大灵塔名与(宋)法贤所译《佛说八大灵塔名号经》密切相关。杭侃：《辽中京大明塔上的密宗图像》，《宿白先生八秩八秩华诞纪念论文集》(下)页590，文物出版社，2002年。周景美分析了《心地观经》的流传进程，主张该部经典和其信仰是经由渤海转入辽代境内的。前揭《辽代八大灵塔图像的研究》，页146－151。笔者认为辽代八大灵塔信仰与佛顶尊胜陀罗尼信仰结合，形成辽代独有的信仰。前揭《辽代八大灵塔的图像特征与出现背景》，页413－414。

‹3› 《大正藏》第十二册，页903a。

‹4› 前揭《全辽文》，页287。

‹5› 前揭《全辽文》，598、806。

〔图十五〕辽上京开化寺出土经幢
辽代　辽上京博物馆藏（笔者摄影）



从经幢刻塔名的现象可知，八大灵塔塔名具有与密教陀罗尼一样的功能。事实上在辽上京开化寺出土的经幢的第一节幢身上刻着八大灵塔塔名〔图十五〕‹1›，并且此经幢的基坛中还刻着佛教徒礼拜经幢的场面，由此可以间接知道当时的信仰状况。另外，在朝阳北塔地宫出土的经幢第三节下层台座中刻着八大灵塔塔名，而在天宫出土的经塔中亦刻着八大灵塔塔名〔图二〕。在义县八塔山八座塔中，两座方形塔塔身上分别刻着“净饭王宫生处塔”和“菩提树下成佛塔”。还有，在白塔峪塔塔身的棱角刻着八大灵塔塔名〔图九〕，该塔地宫内竖立的石板中，八大灵塔塔名与诸陀罗尼刻在一起。

（三）供养菩萨像

朝阳北塔塔身的金刚界四方佛两侧总共刻着八尊供养菩萨像。塔身南、北面的供养菩萨上半身裸露，双辫自两肩垂下，形象略显得稚嫩。与此相反，塔身东、西面的供养菩萨两肩披着略宽的天衣，造型显得圆润成熟〔图四、五〕。右侧的供养菩萨皆向本尊供养莲花盘，左侧的供养菩萨皆持带柄香炉，向主尊供养香。

那么，该塔八尊供养菩萨是否为金刚界八供养菩萨？金刚界主尊毗卢遮那佛和金刚界四方佛的相互供养中出生八供养菩萨，在经典中规定了具体供养的内容，分别是嬉、鬘、歌、舞、香、花、灯和涂香，上述敦煌出土《五佛曼陀罗》中的金刚界四方佛下段两侧即描绘出这八供养菩萨。但朝阳北塔没有表现上述的金刚界八供养菩萨，而是在佛塔这一有限的空间内以菩萨的形式将“供养”拟人化。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该塔塔身东、西两面菩萨像所持的莲枝形柄香炉。这种香炉见于河北宣化辽墓群M2墓室内的《备经图》中，其实物在内蒙古宁城埋王沟4号辽墓内出土‹2›。其器型与韩国国立博物馆藏大康三年高丽莲枝形柄香炉完全一致〔图十六〕，在高丽佛教绢画和石碑中亦可见有这种香炉的例子‹3›。可知，高丽莲花枝柄香炉源头在辽，该塔的香炉浮雕是其现存最早的重要例证。

同地区青峰塔塔身南面和西面也刻有上述两种供养菩萨，这提示该塔直接受到了朝阳北塔的影响。此外，青峰塔北面不空成就佛两侧各刻一尊跳舞的菩萨像，其与金刚界曼荼罗中的金刚舞菩萨的方位和供养内

‹1›　前揭《辽代八大灵塔的图像特征与出现背景》，页413，注释44。

‹2›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宁城县埋王沟辽代墓地发掘报告》页623、629－630，《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

‹3›　［韩］安贵淑：《高丽金属工艺中所体现的辽文化的影响》，《高丽与北方文化》页239－242，首尔：养士斋，2011年。

〔图十六〕大康三年铭青铜连枝香形柄香炉
高丽1077年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



〔图十七〕青峰塔塔身北面
辽代　辽宁朝阳 （笔者摄影）



容一致〔图十七〕。金刚舞菩萨是主尊毗卢遮那佛为了供养北方不空成就佛而使其出生的，由此可知，供养菩萨像与金刚界四方佛一样也是反映金刚界曼荼罗的要素。另外，该塔东面阿閦佛右侧结法界生印的一尊如来像，为辽代仅有的图像‹1›。

三　朝阳北塔浮雕的重要意义

（一）辽代金刚界密宗的复兴

8世纪中叶金刚界密宗由金刚智三藏及其传法弟子不空三藏传播到唐朝都城长安，在唐朝境内十分盛行。经过唐会昌法难(842－845)以后，金刚界密宗势力迅速衰落，密教付法传承不甚清楚，但盛唐时期形成的信仰勉强维持其命脉，至辽代在朝阳地区得以全面复兴。

辽早期太祖平定了在安史之乱(755－763)后定居于朝阳的奚族，尔后将北京一带的汉人强制迁移到朝阳，并设霸州以及彰武军节度使‹2›。据《刘承嗣墓志铭》和《刘日泳墓志铭》记载，唐天复元年(902)刘仁恭投降辽太祖之时，率领数千燕民进入辽朝境内‹3›，刘仁恭的后裔刘承嗣和刘日泳活跃于柳城(今朝阳)‹4›，这使得自辽早期开始，霸州与燕京的佛教就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唐会昌法难时燕京的佛教几乎未遭受打击，因而辽朝燕京的佛教空前繁荣。唐朝包括幽州(今北京)在内的，黄河以北的四镇的节度使都重视佛法，不灭

‹1›　有关这尊如来像，参见前揭《朝阳北塔浮雕图像研究》，页211－212。

‹2›　《辽史》卷三九《地理志三》，页486。

‹3›　王成生：《辽宁朝阳辽刘承嗣族墓》，《考古》1987年第2期；《辽史》卷一《太祖上》，页3。

‹4›　前揭《全辽文》，页365－366、371。

寺庙，不拘僧人[1]，故而很多僧人为了躲避法难逃到河北地区，尤其是离河北比较近的五台山僧人多逃奔幽州[2]，法难以后，许多僧人和信徒到幽州，巡礼石经山。与此同时许多幽州僧人也到全国各地巡礼，弘扬佛法。因为辽早期燕民大举迁移到霸州，加上辽皇室或者民间人士的主导，霸州佛事活动频繁，建寺造塔盛行。例如，天禄元年(947)世宗在霸州凤凰山上敕建华严寺[3]。统和二年(984)章武军管内观察使及霸州刺史姚汉英及其家族在佛塔地宫中供养释迦佛舍利一粒和净光佛舍利十八粒。开泰六年(1017)楚国大长公主，即辽景宗之长女，施财重建朝阳东塔[4]。太平五年(1025)33邑人施游休地建立寺院，太平九年梁氏兄弟建造灵感寺和灵感寺释迦佛舍利塔[5]。到重熙十年霸州升格为兴中府，该地区的核心佛寺延昌寺也得到重修，佛教力量以延昌寺为中心聚集起来，重修期间曾举办两次由辽上京派赴的宣演大师蕴珪主持的佛事仪式，绝大多数霸州官员都参加了活动，成为当地的一大盛况。且在该塔塔身上新制作了“金刚界四方佛”和“八大灵塔”等浮雕，这成为复兴金刚界密宗的契机。

朝阳地区现存14座佛塔[表一]，其中7座塔身都雕有金刚界四方佛。大宝塔、云接寺塔、青峰塔直接受到了朝阳北塔的影响，其形式亦为方形塔，塔身四面雕刻金刚界四方佛〔图八、十七〕。此外，东平房塔、八里堡塔和双塔寺东塔塔身四面亦刻金刚界四方佛。这些佛塔的分布地以朝阳北塔为中心，沿着大凌河连成一线，这一线与从兴中府到中京大政府的交通路线一致[6]，而此交通路延长线上的地区，即辽上京和辽中京也发现刻有金刚界四方佛的佛塔，如辽上京南塔、兴城白塔峪塔和绥中妙峰寺塔等〔图九〕。尤其是妙峰寺塔由辽末天祚帝赐舍利建造，此事表明辽代晚期金刚界密教信仰仍然盛行。此外，清宁二年(1056)应县佛宫寺释迦塔第三层中安放了金刚界四方佛，而寿昌元年大同下华严寺经幢中也刻着金刚界四方佛，可知辽代境内金刚界密宗之盛行。

[表一] 辽宁朝阳地区现存辽代佛塔

	塔名	建造或重修时期	位置	高度(m)	建筑形式
1	朝阳北塔	重熙十一至十三年(1041-1044)	辽宁朝阳龙城区	42.6	十三层**方形**密檐式塔
2	朝阳南塔	辽	辽宁朝阳龙城区	45	十三层**方形**密檐式塔
3	云接寺塔	辽	辽宁朝阳凤凰山	32	十三层**方形**密檐式塔
4	大宝塔	辽	辽宁朝阳凤凰山	16.5	十三层**方形**密檐式塔
5	青峰塔	辽	辽宁朝阳西营子乡	36	十三层**方形**密檐式塔
6	东房平塔	辽	辽宁朝阳大平房镇	24	十三层六角密檐式塔

‹1› [日]园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页196，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2› (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四八，页8018，中华书局，1956年。

‹3› (元)孛兰等：《元一统志》卷二《大宁路》页214，中华书局，1966年。

‹4› 阎凤梧：《全辽金文》页622－625，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

‹5› 前揭《全辽全文》，页651－653。

‹6› 有关当时交通路线，参见中国兵书集成委员会编：《中国兵书集成》(3)，辽宁书社及解放出版社，1988年；[日]田村實造：《遼宋の交通と遼國内に於ける經濟的發達》，《满蒙史论丛》2集，页74，日满文化协会，1939年。

（续表一）

7	八棱观塔	辽	辽宁朝阳大平房镇	34.4	十三层八角密檐式塔
8	黄花难塔	辽	辽宁朝阳大平房镇	32	十三层八角密檐式塔
9	双塔寺东塔	辽	辽宁朝阳木头城子镇	11	单层八角塔
10	双塔寺西塔	辽	辽宁朝阳木头城子镇	13	三层八角塔
11	槐树洞塔	辽	辽宁朝阳南双庙乡	2.6	三层八角石塔
12	大城子塔	辽咸雍五年(1069)	辽宁喀左县大城子镇	34	七层八角密檐式塔
13	十八里堡塔	辽	辽宁凌源城关镇	14	七层八角密檐式塔
14	四官营子塔	辽	辽宁凌源四官营子镇	12	五层六角密檐式塔

（二）新的八大灵塔信仰盛行

辽代密教陀罗尼信仰特别盛行，其中佛顶尊胜陀罗尼信仰(以下简称“佛顶信仰”)普遍盛行于皇室到民间的各个社会阶层，辽国人热衷于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据清宁六年《特佛顶尊胜陀罗尼塔记》和咸雍八年(1073)《特建葬舍利幢记》可知，辽国人将幢如塔一样看待，认为比起建造佛塔供奉舍利，建立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功德更多‹1›。

辽代时，八大灵塔信仰与此佛顶信仰结合，形成新的八大灵塔信仰，颇为盛行。比如，重熙十三年《灵塔记》记载：“礼此塔者，无冤不解，有恨皆销。聋者善听而归。瞽者善视而去。具贪爱者，顿生厌离。被无明者，速得解脱，尘沾出地狱之门，影覆入菩提之室。”‹2›这一记载叙述了礼拜八大灵塔的功德，其中提到了“尘沾”和“影覆”，这两词指称佛顶尊胜陀罗尼的两个神妙功能，即“业障除灭”和“破地狱”。

自7世纪梵本《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传入中国以来，经过屡次翻译留下多种译本，皆叙述该陀罗尼的神妙功能‹3›。其中唐仪凤四年(680)佛陀波利译《佛顶尊胜陀罗尼》是当时最通行和最受欢迎的版本，此译本记载：“若人能书写此陀罗尼，安高幢上或安高山或安楼上，乃至安置窣堵波中……于幢等上或见或与相近，其影映身或风吹陀罗尼上幢等上尘落在身上，天帝彼诸众生所有罪业，应堕恶道地狱畜生阎罗王界饿鬼界阿修罗身恶道之苦，皆悉不受亦不为罪垢染污。”‹4›这些神妙功能用不同的词汇翻译出来，其中地婆诃罗在唐永淳元年(682)《佛顶最胜陀罗尼经》中译为“或为幢影覆其身”‹5›，并在永淳三年重译《最胜佛顶陀罗尼经净除障咒经》中译为“而复吹人少霑身分”‹6›。地婆诃罗在两种译本中都使用了“影覆”和“霑”，可知《灵塔记》中的“影覆”和“霑”来自地婆诃罗的译本。辽国人认为八大灵塔也具有这两个神妙功能，虽然无法知道辽代时八大灵塔和

‹1› 前揭《全辽文》，页747、201。

‹2› 前揭《全辽文》，页160。

‹3› [韩]金永德：《关于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的研究》，《韩国佛教学》25号，1999年，页303－305。

‹4› 《大正藏》第十九册，页351b。

‹5› 《大正藏》第十九册，页356b。

‹6› 《大正藏》第十九册，页360a。

佛顶尊胜陀罗尼结合的具体来源，但在《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中记载，释迦牟尼佛为了济度善住天子说佛顶尊胜陀罗尼，同时，八大灵塔是为了纪念释迦牟尼的事迹而建造，从这两点来看，这一信仰是以释迦为根本的崇敬对象。

辽朝境内现留有20座刻着八大灵塔的佛塔[表二]，其中6座位于辽宁朝阳地区，辽代时八大灵塔信仰在该地区十分盛行。通过分析现存辽塔以及文献记载可知，最早的例子是重熙十一年建造的大王镇罗汉院八大灵塔，该塔完工比朝阳北塔修建早两年[1]，其信仰在朝阳北塔大重修前业已形成并十分盛行。而且《灵塔记》记载："三级之危檐回起，遥似帝幢"[2]，这一记载说明，八大灵塔已被辽代皇室制作成经幢的形式。

［表二］与八大灵塔有关的辽代佛塔

	塔名	位置	建立或重修时期	八大灵塔的形式
1	上京南塔	内蒙古巴林左旗	辽	三层方形密檐式小塔
2	庆州白塔	内蒙古巴林右旗	辽重熙十六至十八年（1047—1049）	三层密檐式小塔
3	静安寺塔	内蒙古赤峰	辽咸雍八年（1072）	二节经幢
4	大名塔	内蒙古宁城	辽	二节经幢
5	半截塔	内蒙古宁城	辽	三层密檐式小塔
6	北郑塔	北京房山区	辽	单层方形小塔
7	独乐寺白塔	河北天津	辽清宁四年（1058）	二节经幢
8	南安寺塔	河北张家口	辽	五层密檐式小塔
9	源影寺塔	河北秦皇岛	辽	五层密檐式小塔
10	康平辽塔	辽宁沈阳	辽	九层密檐式小塔
11	塔山塔	辽宁阜新	辽	九层密檐式小塔和小塔碑
12	白塔峪塔	辽宁兴城	辽大安八年（1092）	塔名
13	朝阳北塔	辽宁朝阳	辽重熙十一至十三年（1042—1044）	十三层方形密檐式小塔和小塔碑
14	朝阳南塔	辽宁朝阳	辽	小塔碑
15	大宝塔	辽宁朝阳	辽	九层方形密檐式小塔和小塔碑
16	云接寺塔	辽宁朝阳	辽	十三层密檐式小塔和小塔碑
17	青峰塔	辽宁朝阳	辽	十三层密檐式小塔和小塔碑
18	八棱观塔	辽宁朝阳	辽	十三层方形密檐式小塔
19	双塔寺西塔	辽宁朝阳	辽	三层方形密檐式小塔
20	八塔子塔	辽宁朝阳	辽	二层方形小塔和小塔碑

辽代时，以朝阳北塔大重修为契机，朝阳地区兴起建造八大灵塔的热潮，之后向全国扩散。有代表性的实例是庆州白塔、天津独乐寺白塔、赤峰静安寺塔和兴城白塔峪塔等〔图九〕，其中庆州白塔和静安寺塔的发愿与辽皇室有关。庆州白塔是兴宗生母法天皇太后发愿建的"释迦牟尼舍利塔"，在该塔塔身上刻着八大灵塔。而据咸雍八年《创建静安寺碑铭》，兰陵郡夫人萧氏创建静安寺，她的丈夫耶律昌是耶律阿保机的旁系

‹1› 北京市文物局编：《北京辽金史迹图志》（下）页8，北京燕山出版社，2004年。

‹2› 前揭《全辽文》，页160。

子孙‹1›，辽道宗赐额该寺院，名为静安寺‹2›。此外，白塔峪塔和独乐寺白塔的建造与辽代学僧思孝有密切关联‹3›。白塔峪塔是海云寺诸僧发愿建的“菊花岛海云寺空通山悟寂院舍利塔”，海云寺乃是思孝驻锡的寺院，思孝受到兴宗和皇室的敬重，在该寺驻锡时驰名全国，而著述了许多佛书，其中一部分传播到高丽，对高丽的佛教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经过高丽传入日本。清宁四年他参与独乐寺白塔的佛事活动，在该塔地宫中安放了释迦牟尼佛舍利六尊‹4›。因为独乐寺白塔与白塔峪塔相同，其塔身棱角刻着八大灵塔，所以八大灵塔、思孝和皇室之间的关联性十分引人注目。在辽代皇室的支持下，辽国人继续建立八大灵塔，其信仰以辽宁朝阳为中心向全国扩散，而且在金、元和明代，八大灵塔还作为墓幢雕刻在禅师的墓塔上‹5›。

四　结论

综上所述，辽重熙十年霸州升格为兴中府，继而进行了对朝阳北塔的全面重修工作。这期间塔外面新雕了金刚界四方佛、八大灵塔等浮雕，并且皇室派来的高僧蕴珪主持了两场大供养佛事。据该塔天宫出土的木胎银盒、蕴珪的身份以及佛事活动的规模可知，该塔重修及其佛寺活动与辽兴宗关联密切。

该塔浮雕组合表现了以毗卢遮那佛为中心的金刚界曼荼罗，融合了新的八大灵塔信仰。首先，该塔金刚界四方佛沿袭了唐代确立的方位、手印和台座的图像范式，其与主尊毗卢遮那佛一样皆表现为戴圆筒形宝冠的菩萨像，其造型特征亦对辽代佛教美术产生了重大影响，范围超出辽兴中府，覆盖全辽国，甚至达到高昌。其次，八大灵塔是辽代首创的图像题材，基于与佛顶信仰结合而盛行的新的八大灵塔信仰，塔名来自于《心地观经》。再次，塔身所雕菩萨像反映了金刚界密宗的供养思想。塔身东、西两面的菩萨像所持的莲枝柄香炉，其器型与高丽的莲枝柄香炉完全一致，是辽代香炉传播至高丽的重要例证。

总而言之，朝阳北塔浮雕当为辽代金刚界密宗复兴的开端，并积极推动了金刚界曼荼罗形式的佛塔建设，并对新的八大灵塔信仰在辽境内的传播起到了重大作用。朝阳北塔浮雕不仅对辽兴中府，甚至对辽全境的佛塔皆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并且对高丽佛教美术也是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博士生]

（责任编辑：何　芳）

‹1›　刘凤翥等：《契丹大字耶律昌允墓志铭之研究》，《燕京学报辑》17号，2004年；王云龙：《契丹大字耶律昌允墓志考释》，《中国古都研究》18号，页50－62，2001年。

‹2›　前揭《全辽金文》，页407。

‹3›　［日］野上俊静：《契丹高僧の小傳と其の佛の教學の傾向》，《契丹佛教文化史考》页98－99，东京：第一书房，1982年。

‹4›　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考古队等：《天津蓟县独乐寺塔》，《考古学报》1989年第1期。

‹5›　前揭《辽代八大灵塔的图像特征与出现背景》，页414－415。